

# 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历史生成、现实构建与未来展望

肖政军, 杨凤城

**[摘要]**党的二十大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表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伟大飞跃中,在现代化认识与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并发展完善了“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的思想方法,这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思想内核与建构原点。从新时期到新时代,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断开拓,“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概念形式逐渐明确、时代内涵日益丰富,实现了话语体系的初步构建。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必须坚持“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增强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实现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的有机融合,提高话语体系的世界影响力与理论说服力。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现代化;中国共产党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主题研究”(项目编号:21&ZD026);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百年演进研究”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22)06-0001-16

doi: 10.3969/j.issn.1009-105x.2022.06.001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①</sup>。“中国式现代化”是习近平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历史发展新阶段提出的新命题,也是党的二十大的主题词。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论断,与此前习近平的“七一”讲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以及习近平在2022年7月26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等,一同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文本基础,建构了进一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页。

步言说、完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重要场域,为从学理上全面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理论界高度关注的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以大历史观审视,在思想脉络上,“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在独立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百年历程中形成的思想认识方法的承继,也是对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的接续。在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史上,“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思考中国现代化何以可能的问题中形成的思想方法与思维方式,其次才是经过“中国工业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等命题演绎发展而来的重要概念。当前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内涵结构、理论来源以至哲学意蕴等方面进行了丰富探讨,但很少对其进行整全意义上的思想史考察,亦即只关注概念生成后的历史,而不关注支配概念生成的思想方法的历史,只关注概念本身,而不关注与之高度关联的其他概念的历史<sup>①</sup>。从整体思想史出发,梳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演变的历史过程,把握其时代意蕴之转换,对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思想内核的历史生成

“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sup>②</sup>按照恩格斯所言,要整全地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思想史,就不应将考察的视角局限于概念文本演变的历史。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身即“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在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sup>③</sup>,是指一种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一方面指要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另一方面指中国现代化必须是独立自主的而非依附性的现代化。历史地看,“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作为一种分析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方法论,初步生成于民主革命时期,基本形成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总体成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其生成演进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理论飞跃之间存在很强的历史关联性。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思想内核初步生成 中国被纳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时间”,正是世界社会主义“时间历史”展开的

①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结构与意蕴等,并不过多探讨概念背后的思想观念及其演变,这可以视为一种狭义的话语研究。参见董慧:《中国式现代化的唯物史观意蕴》,《哲学研究》2022年第6期;李斌雄、魏心凝:《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8期等。当然,也有学者注意到“现代化”话语与其他话语的共生性与互构性,这对于本文以“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互动互构为视角,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时代意涵之演进具有启示意义。参见王建国、田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与“现代化”话语的互动融合》,《江汉论坛》2022年第5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起点,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交汇点,又成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悲惨历史走向尾声的转折点。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资本主义世界扩张“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sup>①</sup>。中国即是在集三个“从属”为一体的情况下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其间既伴随着传统意识形态的逐步瓦解,也伴随着经济凋敝、主权沦丧与社会崩溃等国家衰败问题。“五四”运动后,知识界围绕“中国应向何处去”展开激烈论战。不过,无论是东西文化之辩还是以农还是以工立国之争,大部分论者因其纯粹的抽象主观性的文化决定论倾向,要么主张全盘西化,要么主张保守复古,其分析认识往往脱离了国情。相较之下,一些建党先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敏锐指出中国衰败根源仍在于生产力的落后,文化问题乃是衍生的。如李大钊就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伦理的动摇是“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sup>②</sup>的自然结果。恽代英更是指明中国唯有化为工业国才可以自存,除实现“机器生产化”外无法抵抗列强,“没有法子免于经济破产的惨祸”<sup>③</sup>。在论证现代化才是救亡图存之关键的同时,中共党人特别从唯物史观出发,剖析中国难以现代化的原因。具言之,一是经济上民族资产阶级“视投资为危途”,单靠私人资本开发实业只能是“空中楼阁”。二是政治上无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府保护民族工业,“外来的货物和出口的原料,课税极轻,而内地的货物反不能自由移转”<sup>④</sup>,无法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三是国际上中国因立于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经济上“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国经济竞争的焦点”<sup>⑤</sup>,政治上帝国主义操纵军阀混战,统一与和平永难实现。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得出从发展产业看只有“赶快实行共产主义不可”的结论,另一方面将关于发展实业的具体讨论进一步理论化,构建起社会革命与现代化的本质性关联,认为只要完成革命,不仅社会关系将彻底改造,“实用的生产力”亦会随之发达,现代化乃是水到渠成之事。建党初期中共党人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科学分析,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想社会形态,更是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最优方案,这就在把握实际问题的准度与思想思维的深度两个层面都大大超越了彼时主流的文化决定论观点。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分析中国现代化问题的首次尝试。

如果说意识到革命与现代化的本质性关联是“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思想方法形成的起点,那么毛泽东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为中国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高度自觉的“独立自主”意识,更具有重要意义。具言之,在探索正确革命道路过程中,长期的战争环境,使中国共产党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7页。

③ 《恽代英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9页。

⑤ 《李达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4页。

对军事现代化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的重要性有了深刻感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现代化话语中的核心词汇几乎全由现代化(近代化)的“火器”“军备”“战术”等构成。到了抗战后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更是明确将军事不如人归咎于重工业不如人,指出“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sup>①</sup>,中国革命就没有胜利的基础。沿此出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对“独立自主”之于现代化的意义,以及如何独立自主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有了新的认识。其一,政治、军事上独立自主了,但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因此就要“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能够制造飞机、坦克、舰艇等等”<sup>②</sup>。在“如果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要来欺侮我们的”<sup>③</sup>的认识下,基于毛泽东的战略思考,周恩来在1954年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此后“四化”的内容与顺序虽有调整,但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仍是重中之重,这一认识也成为党中央决心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其二,毛泽东在强调以苏为鉴的同时,强调抓住“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sup>④</sup>这一最大实际,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等等,并将之总结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重要命题,可以说是“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认识与“协调发展”理念的最初表达。其三,中国现代化基础的薄弱决定了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因此“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sup>⑤</sup>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并没有很好坚持自己得出的正确认识,尤其是违背“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原则产生的超越历史阶段与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直接导致“大跃进”与“文革”等重大战略失误,但无论如何,中国始终坚持了走自己的路,特别是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能够既充分利用对外开放机遇又不被吃掉的根本原因所在。从长时段看,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其形成一方面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思想内核初步生成,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现代化实践中更好认识“中国的特点”,进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准备。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思想内核基本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如何实现“四化”成为中共领导人思考的中心问题。在此背景下,1979年初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后,在理论务虚会及各省、自治区、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明确“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法并展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1页。

② 《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05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9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

开具体论述,此后“中国式的现代化”成为党的话语体系中的关键概念,这亦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思想内核的基本形成。我们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的方法论意涵及其思想史意义:

第一,“中国式的现代化”意味着重新确立“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的思想方法,意味着对“文革”中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反思。邓小平除了在理论务虚会上提“中国式的现代化”时强调“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外,在不同场合也多次谈到“理论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sup>①</sup>等等。陈云的“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先把“实事”搞清楚,也是这个意思。如果说“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民主革命时期强调的是把握革命与现代化的本质关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强调的是“独立自主”,那么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邓小平等人基于对“文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左”的错误的反思而强调“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只能是就更深层、更本质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而言。尽管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都曾从不同角度论及“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但“文革”的惨痛教训让中共领导人更深切认识到,提出过正确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不代表能一直坚持好,如果只是“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sup>②</sup>。因此,重新强调“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原则,不仅仅是恢复传统,更是在反思“文革”的强大思想动能作用下,借由“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明确概念表达,将“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原则内化为强烈的方法论自省与自觉。因此,“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生成,意味着作为方法的“中国式现代化”,亦即“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思想内核的基本形成。

第二,重新确立“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的方法原则后,“中国式的现代化”意味着对不符合实际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修正。基于对中国与西方现代化实际差距的再认识,邓小平与金日成会谈时就说,“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sup>③</sup>。邓小平认识到,此前提出20世纪内实现四化的目标难以实现。因此,他从1978年5月接见马达加斯加经济贸易代表团开始,多次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可能但“不那么容易”这类话,在1979年各省、自治区、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更明确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sup>④</sup>,就是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上千美元。

第三,如果说重新制定现代化战略还只是作为方法的“中国式现代化”之历史意义的初步彰显,那么由“中国式的现代化”产生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追问,则是其历史意义的最高表现。如1979年《人民日报》纪念“五四”六十周年社论,就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7、16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3页

调继承五四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和创造“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sup>①</sup>。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人们事实上是将“中国式的现代化”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思考的,而关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追问和探索,最终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开辟,中国现代化亦由此实现了跃进式发展。在思想史意义上,以“中国式的现代化”为起点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元问题”的追问,衍生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分配制度以及如何进行资源配置等系列重要问题的再思考,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提供了充分历史动力。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思想内核总体成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立足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两个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如何解决新时期以来“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关键答案,为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正确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的“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是“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哲理”<sup>②</sup>,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守正创新,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精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特色与本质要求提供了科学指引。

就“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特色而言,举其荦荦大者,如要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和“系统观念”的方法论。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涉及十四亿多人口,规模之巨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必将面临“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如果不守四项基本原则之“正”、不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正”,就会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犯颠覆性错误;如果不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而是对矛盾困难熟视无睹,因循守旧或者骄傲自满,就会积重难返甚至错失改革良机。此外,由于中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人口分布状况,由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很大不平衡,实现“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坚持“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用整体性眼光、全局性思维为我国现代化的总体进程谋篇布局。再如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就应该坚持“胸怀天下”与“自信自立”的方法论。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独外于世界现代化历程的现代化,要实现“中

① 《解放思想,走自己的道路——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人民日报》1979年5月5日,01版。

② 《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8日,01版。

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提升自我,在“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sup>①</sup>中扩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sup>②</sup>,要以“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有不畏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的志气,有不怕外来打压遏制的骨气,而这种志气和骨气又最终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就“中国式现代化”之本质要求而论,如要认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和“问题导向”的方法论。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百年不懈奋斗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sup>③</sup>，“共同富裕”的伟大理想镌刻熔铸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当中;从现实维度看,“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更与“高质量发展”紧密相关,“共同富裕”既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的内在需要,也是防止重蹈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级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sup>④</sup>覆辙的必然要求。此外,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体现了“自信自立”的方法论,再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可以用“胸怀天下”的方法论进行把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对“中国之问”作出的最符合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更为中国共产党人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提供了总的方法论。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构建的视角来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炼总结的“六个坚持”是“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思想方法在新时代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宝贵成果,更是指引全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整体思维方式,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不断丰富发展的建构原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六个坚持”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思想内核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飞跃中实现了总体成熟。

## 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概念体系现实构建的双重维度

单从概念史看,“中国式现代化”无疑是从“中国式的现代化”演绎而来,二者不仅具有直接的历史承继关系,在词义上也有很大相似性。“中国式的现代化”与“中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页。

②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 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页。

③ 习近平:《坚持人民至上》,《求是》2022年第20期。

④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41页。

国式现代化”不仅都由“中国式”与“现代化”组成,且都强调“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互构性与共生性,强调我们推进的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sup>①</sup>，“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sup>②</sup>。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简单重复呢？当然不是。从前者到后者的概念跃升,实际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它们概念表面形式的相似性,正如列宁所说的是“在高级阶段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复归(否定的否定)”<sup>③</sup>。从新时期到新时代,随着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代课题认识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概念体系以“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为建构维度不断展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中国式”特征亦在此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 (一)“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体系构建的现代化之维

“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党的“现代化”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体系的初步建构与“现代化”再次回到党的话语体系的中心有重要关联,“现代化”也构成我们考察“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体系现实展开的重要维度。如前所述,基于改革开放初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国式的现代化”以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共领导人频繁论说的主题,但当改革行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且不论拨乱反正早已完成,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得到基本解决。因此,“中国式的现代化”只剩下作为“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的战略目标的意涵。与“现代化”相比,同样指涉“一千美元”的“小康”作为本土概念,不仅更容易为民众理解,也更贴近当时中国勉强实现“温饱”的实际水平,“现代化”用来指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更为合适。因此,20 世纪 90 年代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中精力探索经济发展规律,关于“现代化”的密集言说为以“发展”为主题的理论探讨代替<sup>④</sup>。如江泽民先后提出“十二个重大关系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两个根本性转变”等重要命题,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sup>⑤</sup>。胡锦涛作为集大成者,对科学发展观作出重要概括,基本解决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sup>⑥</sup>。历史地看,虽然江泽民、胡锦涛很少像邓小平那样高频长篇论述“现代化”,但也从未忘怀。以“(全面)小康”为目标的全方位实践,以“发展”为主题的理论探索事实上是为进入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10 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22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12 页。

④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党的文献中的“现代化”,多是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词语使用,不具有理论创新意义。参见杨凤城、肖政军:《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的百年演进》,《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思想年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149、205、217、615、617 页。

⑥ 《胡锦涛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04-105 页。



新时代、真正迈向现代化奠基。也正是由此,进入新时代后“现代化”又再次回到党的话语体系的中心场域,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对这一复杂的思想史过程,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

其一,党的丰富现代化实践为“现代化”话语的流行,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生成构筑了坚实基础。至党的十八大召开,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47.3万亿元,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经过五年左右的努力,截至党的十九大,国内生产总值从540000亿元增至827000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0%以上,居世界第一位<sup>①</sup>。经过三年左右的奋斗,习近平在建党一百周年时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sup>②</sup>。总之,无论是已经取得的惊人经济发展成就,还是历史性地消灭绝对贫困,都意味着中国日渐触及现代化的核心层面,真正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与之对应,党的文献中“现代化”话语呈现强势回归态势,现代化经济体系、农业农村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提法先后出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系列重大成就,是“现代化”重新回到党的话语体系中心,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生成的前提基础。

其二,党的理论创新为“现代化”话语的回归与演进提供充分思想准备,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生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对国情实际的审慎考察,习近平在提出“三期叠加”之后,于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作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在此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变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性在于,它在继承新时期以来历届领导人关于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基础上,首次就新时代现代化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完整系统的理论诠释。其中,“绿色”与“共享”是最具原创性与时代性,最能凸显习近平关于现代化问题思考的内容。就“绿色”而言,习近平除了特别强调人民不希望“经济发展了,但生态破坏了、环境恶化了”<sup>③</sup>那样的现代化外,更指出应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要求加快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sup>④</sup>。再就“共享”来看,习近平不仅高频言说“共享”以及“共同富裕”,并将之纳入对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如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以及“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等亦多见于他的讲话。尽管此前党的历届领导人均强调过生态环保以及共同富裕,但将之与“现代化”直接联系起来,与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反思联系起来,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联系起来,且如此高频的言说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正如习近平指出,新发展理念是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页。

③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79-180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5-37页。

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系列理论和理念中“最重要、最主要的”<sup>①</sup>,新发展理念由此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生成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之际,党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围绕“现代化”提出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基本要素。首先,就战略部署而言,在党的十九大明确分两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全会进一步勾画了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科技创新、法治建设、对外开放、国防军事等方面在内的现代化远景目标,特别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此外更是第一次在党的全会文件中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绘就了一幅更加清晰明确的路线图。其次,就历史方位而言,习近平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的新方位,从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长程出发,提出“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识方辨位。再次,习近平结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加速演变的新情况,提出加快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现代化具体战略。最后,习近平明确中国式现代化应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大特征,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指明方向<sup>②</sup>。经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范畴与理论框架基本形成。在2021年“七一”讲话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并在此后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以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行了系统阐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由此初步成型。

从改革开放初期围绕“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密集言说,到以“发展”为时代课题的探索,再到新时代“现代化”话语的强势回归,“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演进呈现否定之否定的发展特征。具言之,邓小平言说“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指向是“先把经济搞上去”,主张的是“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sup>③</sup>的思路。经过新时期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突破,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重提“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sup>④</sup>,其侧重已从“发展起来”转移到“解决发展起来后的问题”。由“发展”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大时代课题的转换,不仅带回了“现代化”话语,更实现了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跃升。

## (二)“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体系构建的社会主义之维

从新时期之初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习近

①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79页。

②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9、377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33页。

平强调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sup>①</sup>,对中国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但不同语境下强调“社会主义”,其参照对象、立意与内容截然不同,这既彰显着“现代化”的丰富时代内涵,也凸显着“中国式”之形态特征的与时俱进,“社会主义”构成观察“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体系现实展开的另一维度。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之时代内涵在参照对象的不同中得到彰显。“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参照无疑是日渐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应的则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老路,此时对“社会主义”的再强调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批判与超越。如果说改革初期强调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其意在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实现形式进行辩护,那么在再次强调现代化之“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模式,“两个必然”的历史转变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西方式现代化老路的超越中得到实现。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之时代内涵在立意的不同中得到彰显。改革开放初期,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正本清源的过程中,一些人不能正确分析造成“西强中弱”现况的历史根源,甚至得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造成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的现代化”,通过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自主性得到有力辩护。同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背景下,邓小平、江泽民不断强调“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其实质在于强调中国必须进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sup>②</sup>。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国社会主义之“特色”的合理性早已得到充分论证。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讲社会主义还不够格,那么四十年后,中国早已超过“人均四千美元”的目标,在取得了既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又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上,可以十分自信地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sup>③</sup>,为解决西方不能解决的世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新时代再次强调中国现代化之社会主义性质,是基于现代化实践取得瞩目成就与现代化理论实现重大突破的事实依据,而对社会主义制度之优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② 邓小平对此讲得很清楚,即西方世界进行和平演变的目的,就在于“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放弃社会主义就等于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国,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越性充满自信的论证表达。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之时代内涵在具体内容的拓展中得到彰显。结合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一套“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要求的制度结构”<sup>①</sup>。如果说邓小平所言的“再有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sup>②</sup>在当时还只是一种期盼,彼时社会主义改革还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那么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制度建设分量更重”“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sup>③</sup>,社会主义改革的对象扩展为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全方位、多领域的制度体系。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擘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蓝图,七年内接续推进修改宪法、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以及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列战略部署,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明显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得到全方位完善。

最后,如果说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是就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而言,那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则更突出其文化向度,即更多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拓展离不开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如习近平就多次谈到,“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必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sup>④</sup>。对此,从大历史观出发,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理解:

从宽视野看,结合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现代化往往从比较不重要的技术领域开始,逐渐向深层的政治、文化领域渗透<sup>⑤</sup>。不少后发国家在以技术、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起步阶段比较顺利,但往往由于没有一套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没有处理好现代化与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关系,进入更高阶段后“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sup>⑥</sup>,最终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因此,越是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越要警惕“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就越需要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就越要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归根结底也就越需要发展方向上的清醒与理想信仰上的坚定。

从长时段看,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中西与新旧之间的冲突、纠缠,始终伴随

①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12页。

④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06页。

⑤ 汤恩比:《世界与西方》,果仁译,台北:牧童出版社,1976年,第74-75页。

⑥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90页。

着中国现代化的数百年历史进程,而中西新旧间的张力与矛盾,又往往集中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体系的过程中,一方面在“自信自立”的基础上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论两种倾向;另一方面在“胸怀天下”的同时不忘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反抗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反对“全盘西化”的错误倾向。结合历史来看,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关于要拥护“德先生与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的鲜明主张,还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的著名论断,都可以说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更多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传统文化。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党的领导人更多以继承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并特别从抵制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出发,着力从传统文化中发掘现代化的“中国式”基因,将科学对待传统文化上升到决定能否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习近平就多次警示人们,“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可能顺利地走向现代化,必须“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sup>①</sup>。

### 三、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未来展望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话语作为反映内容的相应形式,不仅是对道路在这一发展阶段本质特征的表达,还会以反作用力的方式影响下一阶段发展的先决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sup>②</sup>。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建构不仅是现时指向的,更有其未来向度。

第一,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构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也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如前所述,“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的核心要义,就是实事求是与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现代化问题得出的结论,而要坚持独立自主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原则,否则就走不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话语是对道路的理论表达,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同样需要实事求是与独立自主。就实事求是而言,必须认清党的领导是中国的最大国情,是最根本的“中国的特点”。实事求是基础上的独立自主,就意味着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从被动卷入现代化到引领现代化的百年历史,说清楚为什么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间,实现现代化的“机会好似呼之欲出”但“把握这种机遇的领导集团”<sup>③</sup>却屡屡失败,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③ 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第256页。

下就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而不是“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sup>①</sup>。

第二,在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基础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世界影响力。首先,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基,“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无法实现现代化,还很可能导致历史的悲剧。丧失了文化自觉自信构建起来的话语只可能是鹦鹉学舌,有了自觉自信,话语构建才有其实质意义。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世界意义只能在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中实现。冷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资本、科技与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大肆推行“文化帝国主义”,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其构造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类型”,鼓吹只有同时实现私有化与票决民主才能带来现代化。这种“理想类型”不仅不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甚至也是对发达国家本国现代化历史的歪曲(如德、日起初即是走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西方国家强迫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夜之间实现自己未曾实现的现代化神话,其后果就是“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sup>②</sup>。不去破除西方文化霸权的迷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难以立住,“文明新形态”之“新”亦难以彰显。最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批判,是对其文化霸权而非文明实质的批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规定性,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一般本质性。具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彰显,不是以新的文化霸权代替旧的文化霸权,而是以主张和合共生的文明新秩序代替冲突扩张的文明旧秩序。在这种新的文明秩序中,“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sup>③</sup>,人类社会将在“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得到重建。正如马克思指出,完全物质的而非“纯粹的抽象”的行动才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决定因素<sup>④</sup>,要提高“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世界影响力,就必须锚定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共同关切的风险挑战与利益诉求,充分吸收整合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在提高中国理论满足世界需要程度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与时俱进。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历史进程中实现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的有机融合,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理论解释力。作为相近的概念表达,“中国模式”因部分西方学者在新世纪初提出“北京共识”而一度被热议,但很快遭到不少质疑。抛开关于“模式”概念界定的分歧不论,人们之所以质疑“中国模式”概念的合理性,很大原因在于这一概念缺乏理论内核,在于忽略了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主题的全部实践的本质是“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

①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页。

②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8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

统一的发展进程”<sup>①</sup>。以现代化为核心的民族复兴伟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间的本质关联,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最大理论增量。事实上,无论是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三个“意味着”与三个“重大意义”归纳概括,还是《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的总结,都是从民族复兴、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三个维度展开论述,这三个维度实际构成党的话语体系演进的主要脉络<sup>②</sup>。

从大历史观看,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以及推动人类文明与世界现代化发展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是由中国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中的处境决定的。具言之,“世界历史”在传统中国的展开,是资本主义沿着历史前进的逻辑不断前进的必然结果,但“世界历史”在将传统中国纳入自身逻辑的过程中,又造就了宣判自己死刑的历史主体——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是民族性的历史时刻,更是世界性的历史时刻。由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中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由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与拓展,在资本主义文明主导的世界秩序之外出现了一种新文明形态的可能: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与人类文明史共同交汇于新时代,这为实现民族复兴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与现代化话语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时代的理论精华,无疑是民族复兴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与现代化话语实现有机统一的重要载体。《决议》已经从民族复兴话语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两个维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出了“两个是”的重要论断,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提炼整合,不断系统化理论化,实现现代化话语同民族复兴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有机统一,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必然要求与根本路径。

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推进现代化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sup>③</sup>。同样,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也必须把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这构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量,也成为回答“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之关键答案。但是,现实的真理不等于真理的现实性,思想唯有通

① 吴晓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② 其中第一、二条讲的是民族复兴,第三条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第四条“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则是论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2-64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页。

过话语实践,才能在现实中展现其真理性。如何直面西方话语霸权的窠臼与偏见,以科学的话语体系揭示当代世界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比经验事实更高的现实”<sup>①</sup>,这仍需要思想理论界共同努力!

(作者:肖政军、杨凤城,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责任编辑:付继娟)

## The Historical Generation, Realistic Construction and Future Prospect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System

XIAO Zhengjun, YANG Fengcheng

**[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roposed that the central task of the CPC in the new era is to advanc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with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not only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PC's century-old modernization thought, but also the theoretical expression of the new path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three great leap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modernization, the CPC have gradually formed and developed the ideological method of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which constitutes the ideological core and construction origin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system. From the New Period to the New Era,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oa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oncept and form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has gradually become clear, 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ew Era has been increasingly enriched, realizing the initial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the New Era,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ust adhere to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promote civilization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on the basis of enhanci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strengthen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realiz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discourse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and improve the global influence and theoretical persuasiveness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Keywords]**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system; modern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73页。